

T 9437

机 密

编号 (85) 40

总号 188

访 问 记 录

时 间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批注

地 点 山西驻京办事处

接谈人 罗贵波

访问人 李海文、熊华源

记 录 熊华源 整理人 熊华源

访谈事由 (一)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建立；(二) 中越关系的一般情况；(三) 洪水同志的情况；(四) “文革”中，周总理对外交部领导干部的保护。

最了解越南情况的是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恩来、少奇、朱老总，还有王稼祥、李克农（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他们都去世了。在世的，知道情况最多的是杨尚昆同志，聂荣臻同志也管过对越工作；我和乔晓光同志当时都在中国驻越南政治顾问团

丁 9437

机 密

编号 (85) 40

总号 188

访 问 记 录

时 间 一九八五年六月一日 批注

地 点 山西驻京办事处

接谈人 罗贵波

访问人 李海文、熊华源

记 录 熊华源 整理人 熊华源

访谈事由 (一)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建立；(二) 中越关系的一般情况；(三) 洪水同志的情况；(四) “文革”中，周总理对外交部领导干部的保护。

最了解越南情况的是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恩来、少奇、朱老总，还有王稼祥、李克农（建国后任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部长），他们都去世了。在世的，知道情况最多的是杨尚昆同志，聂荣臻同志也管过对越工作；我和乔晓光同志当时都在中国驻越南政治顾问团

工作，我是团长，乔是副团长，韦国清同志在军事顾问团任团长，梅嘉生、邓逸凡任副团长，乔晓光同志负责土改；方毅同志是在日内瓦会议后越南中央准备迁返河内时由党中央国务院派来越南负责经济援助工作。因此他们对越当时的情况也比较清楚。

我是一九四九年底奉命从北京动身去越南的，第二年初到达越南。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的建立

先从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字谈起。一九五四年五月奠边府战役的胜利，促进和推动了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七月二十日印度支那停战协定正式签订。根据这个协定，在越南北方的法国殖民军将在规定的日期内陆续从河内、海阳、海防等地区撤至北纬十七度线（临时军事分界线）以南，这样意味着进行了八年之久的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

这时，虽然我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就建立了外交关系，但由于越南还处在艰苦的抗法战争的环境中，因此，我国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交后都一

直没有派大使去越南。法国殖民军撤离北方，表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劳党中央将很快走出山沟返都河内，我国向越南派遣大使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到九月中旬，周总理把我召回北京。他对我说，你不要在越南搞内交了，搞外交去吧，去当新中国驻越第一任特命全权大使，赶快去建立大使馆。我说，现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还呆在山沟里，没有搬河内，连主席府都没有，怎么呈递国书呢？周总理对我说，就是要你这个时候去，这时去最好了。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我们要抢在苏联的前头，你懂不懂？如果越南政府返都河内后我们才派大使，苏联就可能抢在我们的前头。接着，他说，苏联现在不可能到山沟里去建馆，不可能在山沟里呈递国书，而我们偏偏在山沟里建馆，向胡主席呈递国书。抢在苏联的前头，就表现出我们国家在外交上对越南的真正支持，在中越关系史上创造新的一页。周总理的一席话，使我明白了在山沟里建馆的深刻含义。周总理还嘱咐我，你要尽快走，要在我国国庆前赶回越南，在国庆前呈递国书，并且举行我国建国五周年国庆招待会。周总理的指示非常具体。

行前，我方把这一情况告诉了越南，跟他们事先打了

招呼。接着，我匆匆忙忙启程赶回越南，同时带去从国内筹办的举行招待会所需的吃的用的，比如酒呀，烟呀，菜呀，糖果糕点呀，等等。

由于我当大使之前，是中国派往越南的顾问团团长，经常同越劳党中央和政府领导人直接接触，同胡主席直接接触，因此，越南对我这个大使很特殊，我成了一个很特殊的大使。我从睦南关（原叫镇南关，现名友谊关）进入越境后，我在途经的几个省县停留或住宿时，越方都为我举行欢迎仪式、宴会，破格接待我。越方对我的友好接待，反映了越南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和尊重。

我到了太原省，越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范文同、武元甲、长征还有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在这里接待了我（当时越南党和政府的办事机构还在山上），接待规格是很高的，然后同我商量了建立大使馆、主席府和递交国书等问题。随后，我回到顾问团驻地开始了建立大使馆的工作。当时建大使馆和主席府都很简单，只要把竹子砍来，把葵叶砍来，房子的架子一搭起，四周用锤开的竹子一编，顶上用葵叶一盖，一座房子就算成了，很简单。建房的主要

材料是竹子，木料用得很少。几天内，越南主席府和大使馆的房子就建起来了，快得很。房子建好后，我就同越南领导人商议了递交国书的问题。

从大使馆到主席府有十来里地，是山路，因此，递交国书这天，我是既坐了车，又骑了马，还步行了一段。很有意思。呈递国书的仪式很隆重，也是破格的。越南专门组织了仪仗队（不是海陆空三军组成的，只有陆军）。这天，除了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出席接受国书外，总理范文同、总司令武元甲等首脑人物都参加了，按惯例接受国书是不需要这么多人参加的，国家主席出场即可。

在国内时，周总理就对我讲，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国庆招待会，招待越南各界人士，要造成一个声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向越各界人士都发出了邀请。从胡主席起，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凡是能请到的我们都请了。这些人也高兴来。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参加外交活动。国庆这天，我们在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盛况空前，各界人士能来的几乎都来了。在山沟里举行这么个招待会，来这么多人，可不容易啊！

不久（这年十二月），越南政府、劳动党中央、各人

民团体机关返都河内，我国大使馆也跟着搬往河内。这时顾问团还在山沟里，我带着顾问团的电台到了河内。大使馆馆址选在什么地方呢？越方讲任我们挑选。他们曾提出把河内一所最好的学校给中国作大使馆。当时，我考虑接受这所学校不好，就没有接受，而另外选了一个黄姓大官僚的公馆作使馆。越方说，那里的房子太少，不够呀。我说，不够，我们可以挤一挤嘛，总比在山沟里好得多嘛，我们不占学校的房子了。最后，越南同意我们使馆设在那座公馆里了。后来，这所学校被苏联大使馆占用。

继我们中国之后，第二个建馆的就是苏联，它落到我们后面了。所以，在越南外交史上，第一个承认它并同它建交的是中国，第一个在它的国家建馆并第一个向它派出大使的也是中国。现在，我还保存着一套比较完整的当时进行这些活动的照片。建馆之初，我带去一个政务参赞，一个一等秘书，一个三等秘书，加上原顾问团的几个人，算上厨师和司机，使馆总共才有十几个人。

中越关系的一般情况

1、我在大使馆的工作。

中国大使馆建馆后，顾问团和大使馆的工作已经分开。虽然我担任大使做外交工作了，但是对我来说，内交和外交两项工作既分开了又没有分开。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这以前，我是顾问团团长，经常参与讨论越南党和政府的大事。我当大使作为外交官后，本来不应该再参与内交方面的事情了，但越南方面有事仍然老找我商量。胡主席讲，虽然你不当顾问团团长了，但可以给我当私人顾问，作为个人意见而不代表你们中央向我提嘛。因此，一旦有事时，有时他把我叫到主席府去，有时他自己到我们使馆来商量，很随便。尽管胡主席这样讲了，但根据周总理的交待，我还是尽量避免参与意见，只是在没法避开的情况下，才向胡主席提出意见。因为总有个内外分开的问题。胡主席为此产生了某些误会，对我有点意见了，说我当大使后就如何如何了。

当时，越南外交部也并不把我仅仅作为一个大使看待。鉴于我当顾问团团长时所具有的特殊地位，越南外交部有些要找中国大使商量的事情，他们也不直接找我，而是找我们的参赞同志商量，对我相当客气，相当尊重。我想，这决不是对我一个人的问题，从越南对我的态度反映

出对中国党和政府，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尊敬，因为我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布置的任务去帮助越南工作的。

总而言之，在我当大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内交和外交工作是有分不开的，有时内交和外交工作也很难分得那么清楚。

可以说，从中国派顾问团去越南，到日内瓦会议以后越南党和政府机关返回河内之前的这一段时间，中越关系很好，真是像胡主席所讲的，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那时，他们对我们的党中央、对毛主席、对周总理非常尊敬、非常信任，同中国同志的关系非常亲密，对中国的经验也很重视。当时中越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2、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越南。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这次访问，是周总理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第一次访问，我记得好像也是外国政府代表团首次正式访问越南。团长是周总理，副团长是贺老总，随行的有乔冠华夫妇、张彦等同志。这是在中越关系比较好的时候的一次卓有成效的访问。

前面讲到，越南对周总理很尊重，除了毛主席就是周总理了。周总理同胡主席有一层很特殊的关系。早在黄埔军校时期，胡志明在广州就与周总理相识了，而且有深交。当时，胡主席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委员之一，从苏联来到广州，负责“东亚被压迫民族联合会”的工作，并给孙中山先生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当翻译，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周总理这时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当时他们经常交往。所以，胡主席对周总理的感情特别深，非常尊重周总理。

鉴于上述原因，越南对周总理的访问十分重视，欢迎和接待都是破格的，很热情，很亲切。访问期间，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的周总理，同越南各个方面的关系都搞得很好。我亲身感受到周总理非常会做工作。对什么样的人怎样做工作，他都周密地考虑到了，照顾到了。周总理对各方面的人，无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也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他都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注意做南北两方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越南内部，南北两方有很多矛盾。为此，越劳党中央曾向我们提出过，要我们做南方的工作。这些情况，我都向周总理汇报了。周总理了

解这些情况后，尽一切可能做增强南北两方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紧密团结在以胡志明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南方党内有个叫裴公成的同志，早年在苏联留过学，算得上一个老资格。这个人的工作很难做，我在越南做这个人的工作就没有做好，可是，周总理做他的工作就做得很好。黎笋、范雄等都是南方比较有名的人。同时，周总理还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周总理特别注意做这些人的工作，做得很成功，所以在越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南北两方的同志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周总理的评价都很高，说：你们的周恩来确实是一个很能干的外交家。这样，实际上是帮助了越劳党中央、胡主席，对此胡主席非常感谢。

访问中，周总理还做了一件在越南有着广泛影响的事情，这就是到越南两位民族女英雄的庙去献花圈。

这两位女英雄名叫征侧、征貳，是亲姊妹，她们是在抵抗汉朝马援率领的侵略军失败后投江自杀的（一说被斩首于京都）。以后，越南人民在河内还剑湖旁建立二征王庙以示纪念。当时，我们向周总理汇报了有关二征王及二征王庙的情况，并讲到现在越南还有一部分人对新中国不

了解仍害怕中国对越南侵略。我们的汇报，引起了周总理的极大注意，他决定要我们陪他去二征王庙献花圈。

关于越南有个二征王庙的事情，你们问究竟是我们使馆的同志向总理汇报工作时提出来的，还是胡主席提出来的？据你们讲，周总理曾在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作《关于中缅边界问题的报告》时讲，他在同胡主席谈到毛主席经常说我们中国侵犯过越南时，胡主席提到了二征王庙的事情，然后总理决定去二征王庙献花圈。总理要去二征王庙献花圈究竟是听我们汇报后，还是胡主席说了后决定的，据我和当时参加会谈的翻译以及别的同志回忆，在会谈中，胡主席不曾向总理提到过二征王庙一事，只记得是我们向总理汇报到二征王和二征王庙的情况，并讲到越南有一部分人害怕中国侵略越南时，这个问题引起了总理的高度重视，于是决定要亲自去二征王庙献花圈。我想，是不是我们向总理作了汇报之后，总理私下同胡志明交换意见时谈到了这个问题，这倒是有可能的。因为总理要去二征王庙献花圈，当然事先得向胡主席讲讲，因为越南有关方面事先还得作些安排，布置警卫等。

很明显，总理去二征王庙的目的，是要向越南人民明

确表示，新中国也是谴责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的侵略的。周总理的这一行动，对越南的震动很大，在各阶层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认为“中国的风格真高”。

总起来讲，周总理这次出访，主要目的是增进中越两党、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并做越南南北两方领导人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工作。这一目的十分圆满地实现了。这以后，我们大使馆的工作也更好做了。

3、越南的土地改革

我们中国顾问团到越南后，第一件事是帮助越南搞财政、经济、粮食税收工作，顺利地解决了粮食供应的困难，减少了货币发行，活跃和稳定了市场。对此，主持政府工作的范文同赞口不绝。这是我们在越南放的第一炮。这一炮是打响了。所以，越南党和政府提出要中国派各方面工作的顾问去帮助它。

一九五二年越南党和政府领导人开始找中国顾问团商量越南北方的土地改革问题，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越南国会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当时，越南一部分同志积极主张土地改革，以长征为代表，还有黎文亮、黄国越、阮志清，共四个政治局委员。另外一个名叫胡越胜的中央委员并当过

第四联区书记也积极主张土改。政治局委员中，不主张或者反对土改的，有武元甲、黎德寿、素友等人，武元甲反对尤甚，因为他的老丈人就是大地主。范文同态度不明朗，既不坚决主张，也不坚决反对。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比如，范雄，他是南方人，态度也不明确。这样，胡主席很难下决心。后来，他到莫斯科向斯大林讲述了有关情况，斯大林问中国同志的意见如何，胡主席说毛泽东主席主张土改，斯大林说那你就按中国同志的意见办嘛。胡主席回国路过北京时，向毛主席谈了这个问题，说斯大林也同意越南搞土改。回去后，胡主席的决心就比较大了，开始进行土改工作。

为了顺利地进行土改，他要求中国派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去越南当顾问，帮助他们。因此，在一九五三年中央派乔晓光同志带了一批干部同原来顾问团中帮助越南搞减租减息的同志合在一起，组织了一个土改顾问工作团，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帮助越南搞土改试点工作，越南黄国越带了一部分干部参加。试点的目的是培养干部，取得经验。试点的第一至四期，虽然试点面一期比一期大，但只是稍稍增大一点，总的说来，规模不算大，面不算宽，因

此，土改试点的地方都有中国顾问团的帮助，土改搞得比较稳，没有怎么出问题和偏差，即或有，也很少、很小，完全能够把握土改的局势。可是，到了第五期土改，情况就变了，面铺得很大，因此很多土改试点中国顾问都顾及不到，越南同志又掌握不了局势，特别是在第四联区，即胡主席的家乡义安一带，偏差更大一些，搞得更乱一些，所以胡主席家乡的人向他告状、反映情况的就多一些。总起来讲，土改试点，偏差最大的是第五期，其他几期，虽然有一点问题，但不很大，也不多。

搞土改改革，首先涉及到的是政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顾问团主要是向他们介绍中国土改的经验，讲中国是怎样划地主、富农、中农的，我们是怎样分别对待这些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的。另外，对越南制定土改政策提出我们的意见，我们建议，对地主宜划分为这样几类：一是一般地主，一是抗战地主，我们中国一般叫做开明地主或开明士绅，再就是恶霸地主或越奸地主。对前两类地主的政策，应该比较宽大，土改虽然没收，但留的多一些（比中国的地主留的还多一些），同时不要斗争他们，只对后一类地主实行斗争。越南曾经提出过团结富农，还提

出过联合富农，我们向他们提出，团结和联合的应是中农，对富农不能采取团结或联合的政策，而应采取中立的政策。他们基本上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但是，第五期土改就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偏差，没有完全按这个政策办事。前面我讲了，第五期土改试点主要是他们自己搞的，面铺得太大了，他们搞了那么多省、那么多县，我们没有参加多少人，人手少，照顾不过来，因此，虽然越南有些干部受过一些训练，但面太广，政策掌不了啦，于是发生了挖浮财，斗争所有地主的现象，搞得一塌糊涂，局面十分混乱。

一九五六年十月，越南劳动党中央召开三中全会扩大会议，重点是纠正第五期土改出现的错误和偏差。在会上，胡主席发布了罪责诏，承认在土改出现偏差问题上他自己有责任。在这次会上，长征辞去了总书记职务，由胡主席兼任总书记，黎文亮、黄国越辞去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胡越胜辞去了中央委员的职务。这样，越南党高级领导人中凡积极主张土改的都下来了。胡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越南土改出现的偏差，要由越南自己来承担，不能由中国土改顾问团负责。胡主席也曾向我这样说过。当

时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尽管土改出现偏差，但越南也肯定了这一点，土改是对的，有成绩。因为土改毕竟把封建地主阶级给消灭了，土改也分配给农民了嘛。

4、中越柳州会谈

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至五日，从日内瓦会议休会回国的周恩来，风尘仆仆，赶到柳州，同越南党政领导人就印度支那和平的恢复和日内瓦会议关于越南南北临时军事分界线怎样划的问题进行了八次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除总理以外，还有韦国清和我，记得还有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同志，越南方面有胡主席、长征、武元甲、黄文欢参加。对这一次会谈，我只讲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总理做越南同志的工作，并要我和韦国清同志也做越南同志的工作。

在划分临时军事分界线问题上，越南坚持以十六度线为界，法国人坚持以十八度线为界，两国意见相持不下，这样下去，势必影响印支和平的早日实现。法国人为什么坚持十八度线呢？因为这里有条同老挝相连的公路，叫九号公路，假若划给越南北方后，对法国很不利，这是一；第二，如果以十六度线为界，那么顺化市就划归越南北方